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 编

总第29辑 Lishi WenxianYanjiu

历史文献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总第29辑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 编

历史文献研究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文献研究. 总第 29 辑/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编.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ISBN 978-7-5617-7946-0

I. ①历… II. ①中… III. ①历史—研究—中国—丛
刊 IV. K207-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34763 号

历史文献研究(总第 29 辑)

编 者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
主 编 周少川
项目编辑 陈庆生
审读编辑 李 文
装帧设计 高 山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印 刷 者 江苏句容市排印厂
开 本 787×1092 16 开
印 张 21.5
字 数 411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0 年 9 月第一次
印 数 001—1100
书 号 ISBN 978-7-5617-7946-0/K·333
定 价 48.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

编辑委员会

编委	王记录	邓瑞全	朱杰人	来可泓
	李晓明	张涛	张新民	何林夏
	汪高鑫	周少川	郝润华	曹书杰
	董恩林	陈虎		

主编 周少川

常务编委 陈虎

编委会通讯处：

邮政编码：100875

地址：北京师范大学校内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

电话/传真：(010)58800268

网络地址：www.chla.net.cn

电子邮箱：chlanet2007@163.com

本刊获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资助

目录

1	怀念卞公	仓修良
6	类例与通识:文献学的方法与思维	吴怀祺
18	上海图书馆所藏高密家谱简述	王 铁
22	高密诗派刍议	黄 萍
29	晏子思想的现实意义	龚剑锋 黄雯铮
35	郑学的产生与汉末经学的统一	耿天勤
44	郑玄与畿纬关系臆解	敖 堃 诸伟奇
54	融通六艺,博而守约	
	——郑玄《礼记注》特色一瞥	梅显懋
63	郑玄《论语注》研探	唐明贵
75	爻辰说:郑玄《易》注的显著特色	杨效雷
84	《史记》三家注征引郑注校议	方向东
94	郑学统系的回顾与继承	
	——论张舜徽先生《郑学丛著》中的“宗郑”情结	许 刚
104	西方郑玄研究述评	David B. Honey (韩大伟)
110	大禹传说研究百年回眸	杨 栋 曹书杰
124	帝王与五德:二十四史中所见受命帝符瑞略说	彭洪俊 韩 杰
133	清华简《保训》篇的性质、时代及真伪	黄怀信
137	“君命有所不受”辨正	孙绍华
141	荀子的《诗》学观	李先耕

147	论《易传》的成书与学派归属	张 涛
159	论《史记》十表	柳文全
172	接受美学与唐前小说的史学价值	陈 莹
185	宋儒对《孙子兵法》的继承与发展	王瑞明
192	岂惟擅文豪 端足堪史补	
	——南宋洪迈《夷坚志》口述历史价值笺证：	
	以川陕吴玠抗金兵团为例	陶喻之
212	简论杨万里的诗学与理学	续晓琼
221	时务策与经史策	
	——元代策问的重要特点	邱居里
234	元代象数易学的成就	谢 辉
242	明代《毛诗郑笺》流行小考	
	——以常熟新出明代墓志为线索	任 昉
252	从《绛云楼题跋》看钱谦益对禅的皈依	陈晓华 菅广慧
262	《左传杜解补正》的版本及特色	郭翠丽 吴明松
268	桂馥及其《说文统系图》	孙雅芬
277	法式善与《四库全书》	张 升
286	陈衍《元诗纪事》体例渊源略论	廖菊棟
293	“中国历史文献学”英译名称探研	毛瑞方
299	论儒家经典的历史总结	庞天佑
311	竹枝词的史学价值	
	——以江西竹枝词为中心	孔煜华
331	文献学的探研与实践	
	——读《文献·文献学·文献学家》	涂耀威

怀念卞公

仓修良

听到卞公孝萱先生的西行消息感到非常突然,因为年初还先后收到他两次来信,数月前我们还通过电话,他的声音还是相当洪亮,不料竟于9月5日遽归道山。不仅朋友们感到突然,就是他的子女、弟子也同样感到突然,因为他的西行确实太匆忙了。他这一走,不仅是学术界一大损失,而且对文献会来说更是一大损失,我相信全体文献会会员将会永远怀念这位对文献会作出很大贡献的学术界长者——我们的老会员。

近十多年来,卞公一直称自己是文献会老会员,并且称呼得非常亲切。他确实是一位老会员,还在1980年,我会在武汉召开第一届学术年会时,他已经参加,并被增补为理事。我们之间虽然也是初次见面,却一见如故。特别是散会后,由于当时陆路交通很不方便,于是我们一道乘长江轮顺流而下。当时卞公任教于扬州师院,需在镇江下船,而我则要到上海再转乘火车。同船而行的还有复旦大学的徐鹏先生和华东师大的贺卓君先生等。乘船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交谈的机会。船到镇江时,已是深夜两点,我一直送他上岸,两人还是依依不舍,这就为后来我们两人之间的深厚友谊建立了基础。也就在这近十多年中,我们之间的学术交往逐渐频繁起来。我们研究领域虽然不同,他是古典文学,我是史学,但是相互讨论、互相请托竟然多起来了,特别是他晚年重点在家谱研究,这无形中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共同语言,也促进了我们之间友谊的发展。记得在2003年12月10日,应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程章灿所长邀请,我去为该所相关专业硕士生和博士生作“读书与治学”的学术讲座,晚上宴请时,由于程所长,特别是徐有富教授知道我与卞公是老朋友,故还特地邀请卞公来作陪。老友见面,分外高兴,有谈不完的话语,从学会中老朋友的近况,到学术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乃至社会上、学术界的不正之风和奇谈怪论等。从晚宴开始,一直谈到结束,大家兴致都很高,这是一次难忘的晚宴。就在第二年,卞公就帮了我一个大忙。事情还得从头说起,当时我受山东教育出版社的委托,将我主编的《中国史学名著评介》内容加以增补,将三卷本扩充为五卷本,重点是增补现代部分史学名著70部。那几年我的精力主要都花在这个上面,因为选请每部名著的评介者是最麻烦的一件事。而当时陈寅恪先生的著作就选了两部,因为他是众所周知的史学大家,一部是《唐

代政治史述论稿》，另一部是《柳如是别传》。对于这两部书请谁来撰写评介，起初并没有多思考，因为目标很明确，即请陈寅恪先生的大弟子胡守为教授来撰写。我与胡先生又是老朋友，所以当我提出后，他很乐意地就接受了。可是到了2004年，临近交稿的日期，突然接到胡兄的手示，他的夫人因病突然去世。这种情况下，他自然无法再进行写作，考虑到前一部已接近完成，我请他过一段时间，思想平静下来以后将其完成，而后一部我再另请高明。讲起来就是这么简单，但心里却一直在盘算，因为《柳如是别传》非同一般史书，体裁非常特别。这是陈寅恪先生以诗文证史方法的总结，作者在书中以诗、史互证，是熔文学与史学于一炉的一部史书，没有深厚古典文学根底的人是不能为也。通过思索，突然想到了卞公，心想，这部书的评介撰写，是非他莫属了。于是马上拨通卞公的电话，电波立刻传来了熟悉而洪亮的声音。我开门见山地说明来意，并说明时间很紧，因为许多书稿都已陆续寄到。他首先问我，“什么时候要？”我说，“只能给您两个月时间，行吗？”他回答十分爽快，“仓兄之事，当尽力效劳，两个月时间，一定按时交稿。”他比我年长九岁，但却一直称我“仓兄”，并且称呼得非常亲切，我是一直称他“卞公”。他撰写的书稿寄到时，确实是两个月，非常难得，非常守时。对于我来说，自然是非常感激，因为他毕竟为我解决了一大难题。也正因为如此，我才有可能如期向出版社交了全部书稿。2006年初，五卷本《中国史学名著评介》以全新的面貌和更丰富的内容正式面市。当卞公拿到样书时，是非常满意，非常高兴的。他在电话中极口称赞“这是一部难得的好书”，“肯定会与这些名著一样永远流传下去”，“因为它是由全国上百位名家共同构造而成的”。他还建议，“像这样的好书，应当送到全国去参加评奖”。这就是他对这部书的发自内心的评价。

2008年9月中旬，收到卞公来信，信封正面上方还写了“要件”二字，并且写了要我“亲收”的字样。虽是平信，但信的内容肯定很重要。拆开一看，原来是要我支援他一篇关于家谱方面的文章。现在学术交往中已经很少看到写信了，尤其是手书则更加少见了，为了说明问题，现将此信按原有格式抄录于后：

仓公修良先生道鉴：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今寄此函，请公撰文。《淮阴师院学报》办得很好，明年一月份起，开辟“家谱研究”专栏，由我主持。第一期拟发表公之大作（综论家谱……）及我之小文（对一部家谱，作个案研究），如蒙俯允，至深感谢。公为谱牒学权威，第一期能有宏文为首篇，大增光彩！专此拜恳，渴望佳音。

此颂文安！

八五老弟

卞孝萱拜

9.4

上面已经讲了,卞公晚年,专心于家谱的搜集、研究工作。从来信得知,他还在《淮阴师范学院学报》上开辟了“家谱研究”专栏,并计划在第一期上先发一篇通论家谱的文章,因此信中指定要我给他一篇“综论家谱”的文章。读信后,马上拨通他的电话,告知手示已经拜读,一定遵命三天后寄上《家谱杂谈》修订稿。他听了以后,非常高兴,连声说:“老朋友,不负老朽所托!”这里要作点说明的是,2006年5月27日,应大连图书馆的邀请,我在白云书院的“白云讲坛”上作了《家谱杂谈》的讲演,同年8月26日,卞公亦应邀作了《漫谈中唐诗坛》的讲演,9月23日,施丁先生亦应邀讲演了《楚汉相争的决战问题》,讲演的内容事后都被整理刊登在《白云论坛》第四卷上。^①2008年4月,我又应山东省图书馆邀请,去济南“大众讲坛”作了一次家谱问题的讲演。所以卞公知道我也在研究家谱,故直接提出要我给他“综论家谱”的文章。不过,我的家谱研究,是作为谱牒学内容的组成部分。三天后,我便如约将《家谱杂谈》修订稿挂号寄出。

由于卞公近十多年来,对于学会工作非常关心,因此,会内一些重大活动,我们都事先和他沟通、商量,以听取他的宝贵意见。2007年的年会,又轮上学会的换届,9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我照例和他通了电话,他首先说明因事无法参加年会,接着就陈述了自己对这次换届的几点意见,希望我能尽量将他的意见带到会上,并要我代他向老朋友问好。后来也许考虑到怕我到会上传达他的意见时空口无凭,故没有几天,就寄了一封手书给我,信是写给我和施丁先生两人的,将他在电话中讲过的三点内容用书面形式写了下来,信的最后还附上这么一句:“收到后,请来电话,以免挂念。”现将信的内容按同样格式抄录于后:

修良兄,施丁兄,请转大会主席团:

今值我会换届之际,谨以一个老会员的赤忱,从顺利交接以及新领导班子有成效地开展会务的大局,提供三点建议,供大会参考:

(一)从张老舜徽、刘老乃和到周国林兄,华中师大、北京师大、华中师大先后承担了繁重的会务,成绩辉煌。这次换届,建议在北京师大物色会长,轮流承担会务,发挥大家的积极性。

(二)建议增加几位年轻有为的副会长。举一个例,我推荐西北师大教授、博导、我会常务理事郝润华博士为副会长候选人。理由有三:(1)她科研教学成果显著,(2)是我会杰出的女会员,办过一次年会,有较强工作能力,(3)副会长赵吉惠去世后,我会领导班子中尚缺西北地区学者。

(三)仓修良、施丁两位副会长,是我会有威望,有突出贡献的老领导,这次换

^① 至今我会会员应邀赴“白云讲坛”作过讲演的,已近20位之多。

届,建议仍保留其副会长位置,对几位新的年轻副会长“扶上马,送一程”。

此祝大会圆满成功,全体代表身体健康!

卞孝萱

10.1

收到后,请来电话,以免挂念。

这封信充满了一位老会员对学会的关心与热爱,相信每位文献会的会员,在阅读了这封信后,都会对这位老会员产生敬佩和尊重之情!昆明会议后,他得知自己提的建议都得到会议的采纳,感到非常高兴和欣慰。

为了纪念我会成立30周年,学会纪念筹备小组决定,编辑一部大型纪念集,内容包括30年来有代表意义的照片选刊、历届理事名单、秘书长30年总结、会员的纪念文章以及30年来集刊论文选载。实际上分量最多的是论文选载,这是要从30年来我会已出版的27辑集刊近千篇会员论文中选取的。工作量自然是相当大的,因为选载的论文首先要能够展示我会会员30年来在文献学领域专深研究的水平,同时又要能反映出代表近两千会员的普遍性,因为我们毕竟是群众性的学术团体。没有想到,纪念筹备小组最后竟将这个难题交给我做,几经推辞不掉,最后只好勉为其难。考虑到责任之重大,特邀请周国林、来可泓二位先生一同来做,一些疑难问题则与施丁先生商量。在挑选之前,我们也确定了几条原则。由于考虑到纪念集篇幅的限制,要能让更多的文章入选,因此在保证代表性的同时,文章篇幅简短最好,可以多人选几篇。当然,这也是不得已的做法。就在这个时候,收到卞公2月16日(2009年)来信,信的内容不长,当他得知要编辑文集挑选文章后,来信自荐,希望能选取最新发表在《历史文献研究》第27辑上的《大小方考》,全称是《〈光宣诗坛点将录〉“大小方”考》。说实在的,收到信后,我没有马上给他回答,心中一直在盘算,因为这篇文章实在太长,有两万多字,怎么办?于是我立刻与施丁先生通了电话,两人共同商量,觉得老先生既然已经开了口,就很难将其挡回。这种情况,该照顾的还得照顾。两人商量并取得共同看法后,我这才给卞公打了电话,告诉他,我们同意他的自荐。他听后非常高兴,连声谢谢。这封信的最后,他还特地写了“争取参加今年年会,与兄等快晤聆教”。此信全文不长,亦按原有格式抄录于后。由于现在电信事业的发达,目前已很少有人写信,尤其是手书就更少了,许多年轻人对于如何写信也不知道,所以卞公的三封来信,我都按照原信格式抄录。既然是原信抄录,对于这封信中开头两句话就要作点说明:“从大量文章中,每人选出代表作一篇”,这里所讲“每人选出代表作一篇”,并不是说每位在集刊上发表过文章的会员都可以选出一篇代表作。我们上文已经讲了,由于篇幅所限不可能这样做,这里附带说几句,还请广大会员见谅,并向没有入选的会员们表示歉意!卞公原信是:

修良教授兄：

恭贺新禧！

兄从大量文章中，每人选出代表作一篇，甚为辛劳，至为敬佩。选定后，是否仍请原作者校阅一下，然后付排？弟发表文章不多，不知兄选何篇？我自荐最近发表之“大小方考”一文，不知兄意如何？

原拟在拙编“家谱研究”第二辑发表之大作，现遵照兄电话指示，撤出此篇。

第一辑由淮阴师院寄样书，汇稿费，感谢兄之支持，今后仍请赐稿。

争取参加今年年会，与兄等快晤聆教。专此，顺颂文安！

八六老弟

卞孝萱拜

2009. 2. 16

作为一位老会员，卞公对学会的感情确实是很深厚的，晚年曾多次想参加学会的年会，都因故未能成行，因而对学会 30 周年庆祝大会，他曾多次表示要争取参加，故他在这封信的最后又写上“争取参加今年年会，与兄等快晤聆教”，这完全是发自内心的。非常遗憾的是，距离开会时间只有一个多月，他便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对于他的仙逝，只能写上数言，深表哀悼！并以此永远寄托我们的怀念之情。

（本文作者仓修良，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类例与通识:文献学的方法与思维

吴怀祺

〔摘要〕 本文从陈垣先生的类例之学说起,追溯中国古代史学由类例求得通识的优良传统。讨论了刘知幾的“区分类聚”,郑樵的“类书如持军”,清代小学的分类归纳法,以及章学诚的“圆神方智”等史学方法和史学思想,强调类例与通识仍然是发展现代文献学的正确观念。

〔关键词〕 类例 通识 研究方法 治学思想

类例的方法是历史文献学工作的基本方法,也是文献学工作的基本要求。对于发展当前的历史文献学,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一 “类例”思维与陈垣的史学成就

陈垣(援庵)先生在中国近代文献学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白寿彝先生在《纪念陈垣校长诞生一百周年》中对陈老的治史成就作出了全面的评价,从方法论的高度上,论说陈老的治史的特色,说:

他在治学方法和撰述体例上,善于从个体看一般,从类例的探索中引导学者进窥全貌。^①

这就精辟地指出了陈先生的治学特色,通过“举例以明通则”,把考史所得加以条理化,形成一定的治史法则。他在校勘《元典章》时,就是举例以明通则,总结出校勘四法:

一为对校法。即以同书之祖本与别本对读,遇不同之处,则注于其旁。

^① 白寿彝《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0页。

二为本校法。以本书前后互证,而抉摘其异同,知其谬误。

三为他校法。即以他书校本书。

四为理校法。即不凭本而凭理。

这就把校勘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校勘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

《史讳举例》、《元典章校补释例》、《旧五代史辑本发覆》“都是显著地以列举例类的方法说明史事”^①。

陈垣治史善于钩稽排列,以窥史全貌。《元也里可温教考》等论著,从各种材料中,钩稽出同类的内容,从而展示历史事物的全貌或全过程。

另外,陈垣先生在《通鉴胡注表微》一书中,同样是类辑史事,进行论辨,进而“以表隐微”。他从胡三省的注文中,探索出胡氏的包含在注文中的思想,发展传统的史考,一是考史实、史文,二是考出思想、感情和观点。

总之,陈垣先生用近代的科学方法,整理文献,并进而归纳出文献学工作的法则,得出新的认识,将考史、论史、述史结合起来,从而发展了传统的考据之学。“他所讲究的类例,是一种分类列举法。他在一个专题下搜集许多材料,区分类别,找出一定范围内的通例。”^②

陈垣先生的治史方法与思维,是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治史的继承与发展。他的治史实质上包括了类例与通识两个方面的基本精神。讨论这一历史学的传统,能使我们对陈垣先生的史学工作有更深入的认识。

二 “区分类聚”与刘知幾的史学评论

刘知幾以“家”论史学的渊源,展示史学发展的流变,继承了考镜源流的治学传统,表明经史同源。《尚书》在刘氏的眼里地位十分重要,他说:“夫《尚书》者,七《经》之冠冕,百氏之襟袖。”^③而《尚书》也是史学之源。由《书》、《春秋》而有《史》、《汉》,是史学逐渐形成独立的学科的过程。刘知幾在《编次》篇中说:

昔《尚书》记言,《春秋》记事,以日月为远近,年世为前后,用使阅之者雁行鱼贯,皎然可寻。至马迁始错综成篇,区分类聚,班固踵武,仍加祖述。

^① 白寿彝《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0页。 ^② 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6页。 ^③ 刘知幾撰,浦起龙通释《史通》内篇第四卷《断限》,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史学与经学同源,又从中演变成独立学科,很重要的一点是“类”的思想的运用,所谓“至马迁始错综成篇,区分类聚”,也就是这个意思。刘知幾说到“类”的地方很多。

类聚思想促成史书在编纂上走向成熟,“类”又是立例的方法,史之分类、立例,以及刘氏说的“别立科条”等都是这一含意。即如史传杂篇,也当“区分类聚,随事立号”^①。分类不清,会导致史书撰写上的混乱。“类”又是史学评史的方法。刘知幾说:“盖闻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薰莸不同器,枭鸾不比翼。”“史氏自迁、固作传,始以品汇相从。”他批评史书中类聚上的混乱,是朱紫不分,兰艾相杂,“是谁之过欤?盖史官之责也”。他又说:史官之责,是“能申藻镜,区别流品,使小人君子,臭味得朋,上智中庸,等差有叙,则惩恶劝善,永肃将来,激浊扬清,郁为不朽者矣”^②。刘知幾的论史体、史例、史法以及评藻人物,无一不是“类”的思想的运用。他的思想中消极的一面,如等级名教观念、史法论反映出的等级尊卑思想,也同样是一种“类”的理路,其内涵则是另一种性质。

刘知幾说到《史通》的写作经历时,说:

自惟历事二主,从官(或作“宦”)两京,遍居司籍之曹,久处载言之职。昔马融三入东观,汉代称荣;张华再典史官,晋朝称美。嗟予小子,兼而有之,是用取思其忧,不遑启处,尝以载削余暇,商榷史篇,下笔不休,遂盈筐篋,于是区分类聚,编而次之。^③

可见,“区分类聚”也是他编纂《史通》的基本方法。刘知幾研究、总结史学和编纂《史通》的基本方法是“类聚”的方法。章学诚说刘知幾言“史法”,但刘氏的史法基本特征是什么,章学诚没有明说。刘知幾的史法,一般地说,是谈史书编纂的方法,谈体裁、体例确定之法,但刘氏法,也是《史通》方法论的内在精神,是“类聚”。这只有通过刘知幾的《史通》作全面的分析,才能有更深的体会。

值得重视的是刘知幾“类”的思想中的积极因素。首先,刘知幾说的“类”和他论源流的思想是结合在一起的。他关于“家”和“类”的观点相联系。其次,他说:“夫名以定体,为实之宾,苟失其途,有乖至理。”^④就是说,“类”之名,应当从内在的内容出发,使之名实相符。刘知幾批评那种“貌同心异”的分类,也是基于他的名实论。如后世一些名为“某某尚书”的作品,与《尚书》书名相同而精神相异,不能列入《尚书》家。又如《汉书》的《古今人表》,其失在于,把古今人物强分之以三科,定之以九等。另外,刘知幾论“家”、“类”与论流变相统一。

① 《史通》内篇第4卷《题目》。 ② 《史通》内篇第7卷《品藻》。 ③ 《史通·原序》。 ④ 《史通》内篇第4卷《题目》。

史有六家,有二体,但史又有变异,“爰及近古,斯道渐烦,史氏流别,殊途并骛,樞而为论,其流有十焉:一曰偏记,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里书,十曰都邑簿”^①。刘知幾的通与类的思想结合,是他的区分类聚的思维的一个重要方面。

但是也应当看到,他的通和类的思想,为他的名分等级观念所窒息,很多地方,他以封建名分等级的礼教的“实”,去确立“名”,又是以先验的“名”规范现实世界,从而使自己“名以定体,为实之宾”的很好命题走向反面,同时也大大削弱了他的史学通识。他企图以立例的方法规范史学于固定的框架之中,稍有逾越,即被视为“为例不纯”。中世纪的中国的史学思想、哲理不能很好地发育起来,往往在这一方面可以找到一些原因。史学的总结达到一定的高度,就被限制住了。“类例”与“通识”不能融合,则会阻碍史学评论的深化。

三 “类书如持军”的学术方法论的提出

宋代郑樵在批评前代的文献学时,提出了治学“类例”方法的价值。

他在《通志·总序》中说:“学术之苟且,由源流之不分,书籍之散亡,由编次之无纪。”这是从文献典籍保存角度来说文献“编次”的重要,已经涉及分类的“类例”了。关于类例在治学中的意义,他有一段话,说:

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人有存没,而学不息。

……

类书犹持军也,若有条理,虽多而治;若无条理,虽寡而纷;类例不患其多也,患处多之无术耳。……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②

他说:“善为学者,如持军治狱,若无部伍之法,何以得书之纪;若无核实之法,何以得书之情。”^③这里说的“部伍之法”,郑樵解释是:“古人编书,必究本末,上有源流,下有沿袭。”^④

编次“类例”的重要,不只在保存文献上体现出来,而是被提到学术方法论的高度来思考。他要求学者重视“类例”,强调对于治学、整理文献来说,分类的“类例”是研究的基础;

① 《史通》内篇第10卷《杂述》。② 郑樵《通志》卷71《校讎略·编次必谨类例论》,中华书局1987年版。③ 《通志》卷72《图谱略·明用》。④ 《通志》卷71《校讎略·编次必记亡书论》。

而分类又必须探究文献本末源流与沿袭。像这样以明晰的表述,论说了“类例”与“通识”结合的必要,是空前的。清人章学诚说:“自刘、班而后,艺文著录,仅知甲乙部次,用备稽检而已。郑樵氏兴,始为辨章学术,考竟源流。”^①这就丰富、发展了我国学术史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传统。

中国古代的学术分类思维有自己的特点,同时也促成了有特色的治学方法论的形成。

四 清人治小学的思维

清代乾嘉的考据的特色、成就是多方面的,而在方法论上有特色的,是小学。小学又和清人的考据结合在一起。清人治文字、音韵、训诂,一个重要思维(也是方法),就是分类的思维。

清代考据学在治学思维上,实在是分类的归纳思维。梁启超说清代治学实为近代归纳法,是很有见识的。他说:

吾研究此问题所得结果虽甚微末,然不得不谓为甚良,其所用研究法纯为前清乾嘉诸老之严格考证法,亦即近代科学家所应用之归纳法也。诸者举一反三,则任研究若何大问题,其精神皆若是而已。吾此一段乃吾全书行文体例不相应,读者恕我!^②

王国维也说:

自汉以后,学术之盛,莫过于近三百年。此三百年中,经学、史学足以陵驾前代,然其尤卓绝者,则曰小学。^③

清人在小学上取得突出成就,重要的思维是利用分类研究。《说文》分成五百四十部,在归纳九千三百五十三个字的基础上,以《易》的“方以类聚”的“类聚”为方法。许慎在《说文解字·后叙》中说:

^① 章学诚著,王重民通解《校雠通义通解》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②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7页。^③ 王国维《周代金石文韵读·序》,《王国维学术经典集》(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0页。